

## 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综述

现代化问题是一个牵涉甚广的研究课题。总结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不难看出，“现代化是一个涉及人和社会的根本性变化的总体性变革”。而变革主要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以及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sup>①</sup>这两个层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作为现代化变革的层面之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核，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一国文化，并使之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是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论题。在比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海内外许多华人学者对中国如何实现文化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根据国内学者沿用的划分标准，这些思想观点可归类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如张岱年先生认为，“纵观整个 20 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三种主张，即，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sup>②</sup>）。三大学派在相互比较、相互吸收中得到融汇贯通，思想逐渐趋向统一。因此，回顾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现代化的理论，理清三大学派的思想脉络，不仅将有利于为探索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借鉴，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 一、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进程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沉重的历史教训和中西方的现实差距激起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思考——中国如何才能摆脱落后局面？在现代化进程中，何种建设理念和方法才能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呢？这些问题反映到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and 方式等问题。近十年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观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不少文化界学者就现代化问题重申或提出了自身的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的建构涉及系统而复杂的文化观和方法论等根本性问题，是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化。下面笔者将以文化立场为划分标准，分别阐明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学派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它不仅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导航，而且为我国文化向现代化迈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张岱年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和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构想。张先生认为，“综合创新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sup>③</sup>。此外，张先生还展望了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指出中国文化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创新。这其中包括开创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四大潮流有机统一的中国主潮；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体系；创造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方法论体系；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型态；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 21 世界文明等文化现代化理念。<sup>④</sup>

对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论”，方克立教授深表赞赏，“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又最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他认为，综

<sup>①</sup>衣俊卿：《衣俊卿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5 页。

<sup>②</sup>张岱年、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教育与研究》1997 年第 5 期。

<sup>③</sup>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9 页。

<sup>④</sup>张岱年、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教育与研究》1997 年第 5 期。

合创新文化观的四大特点——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sup>①</sup>体现了综合和创新的文化特质。本着综合创新的原则，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下主义、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新的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进一步交流的世纪。<sup>②</sup>通过多元化互补、文化整合，中国文化将在“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势下实现现代化。而这要求中华文化秉承兼并包容的精神，吸收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的精髓。

对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何去何从问题，冯契也在其理论体系中勾勒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冯老先生预言：“随着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会有所进步，民族精神将会高昂，与世界各国文化上的联系将不断扩大，要求对二十世纪作出系统的批判和反思的社会力量与学术力量将会增强，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一个自我批判阶段。”<sup>③</sup>

除了上述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外，国内还有不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对文化现代化进行阐释的研究者。如罗荣渠从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出发，提出现代文化应当是沿着多线的方向发展的，因而我们要摒弃过去多偏重于哲学思辨，且运用单因素或单线因果分析等方法的不足，<sup>④</sup>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重新评估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sup>⑤</sup>正如方克立先生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创造地转化的态度，主张建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 二、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是西方沿袭下来的思想传统，原意核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虽然源于西方，但却深深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从文化发展史来看，近十年来，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李敖、柏杨、傅伟勋和张灏。

以“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自称的李敖是台湾文化界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也是“全盘西化”的倡导者。他曾多次在其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弊端。李敖曾在早年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两文中猛烈抨击带“滤过性病毒”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而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学，亦步亦趋地学、惟妙惟肖地学”，“除了死心塌地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sup>⑥</sup>而这种西体中用的观点是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为依托。

与李敖对中国传统的反叛相似，台湾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柏杨以其“酱缸文化论”批判了传统文化。“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sup>⑦</sup>要脱离“酱缸文化”的污染，国人不仅要靠自身的改造，<sup>⑧</sup>而且应当“崇洋而不媚外”，接受外国人的文化援助。柏杨认为，“崇洋”是有条件的崇洋。“好就是好，祖宗的优点，洋人的优点，同样优点。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在崇洋，但是崇洋与媚外不应连在一起。”<sup>⑨</sup>相比之下，柏杨更多地强调“选择”在文化发展领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有选择的西化论者。

<sup>①</sup>方克立：《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 - 499页。

<sup>②</sup>方克立：《二十一世纪与东西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

<sup>③</sup>冯契：《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sup>④</sup>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sup>⑤</sup>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19页。

<sup>⑥</sup>余杰：《冰与火》，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sup>⑦</sup>柏杨：《柏杨经典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sup>⑧</sup>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百姓（半月刊）（香港）》1984年第11期。

<sup>⑨</sup>柏杨：《柏杨经典文集》，第292页。

从文化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李敖和柏杨是自由主义者中比较激进的学者。相比这下，另一台湾学者傅伟勋先生的观点带有更多的调和性。傅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重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sup>①</sup>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还指出，儒家应当协调自身偏向“行动中心的处境伦理”与西方“规律中心的公正效益伦理”的关系，构建中国本位的现代化综合体系。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冲突，对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示十分赞赏的张灏认为，近现代的历史变化虽然在19世纪初已经开始，但以后的变化却长久停滞在文化的边缘。“变化提升到文明核心的层次是1895年以后，20世纪初才广泛地展开。因此，20世纪一开始便笼罩在由文明核心巨变所造成的危机之下。”<sup>②</sup>这时，文化基本取向的失效、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和精神文化认同的缺乏，中国要突破传统文化的阴霾，就要树立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李敖、柏杨、傅伟勋、张灏等海外学者的思想反映了20世纪末自由主义学派对文化现代化的看法。他们沿袭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的框架内重建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自由主义学派自身发展的理路来看，自由主义学派的全盘西化观虽然曾掀起很大的争论，但如今已逐渐式微；而主张选择性地推崇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学者的思想则至今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 三、保守主义学派

文化保守主义是力图在文化领域找到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力图通过文化脉络融合古今的学术流派。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并非墨守成规的。它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求。在国内，近十年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代表人物主要是牟宗三、刘述先、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和李泽厚。这其中以新儒家为主。他们在处理和协调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富有原创性和思辨性的哲学家之一。牟先生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运用正确的方法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sup>③</sup>在《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书中，他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阐发了自身的观点，“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不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负起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既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适应’问题，而应看成‘实现’问题”<sup>④</sup>。而文化上采取这种积极姿态使牟先生的观点备受学者关注。

牟先生从文化观的角度客观地论述了儒家文化和西化、现代化的关系。而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刘述先更多地借助整体思维方法来寻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中国文化将如何应付现代西方的挑战而重建其智慧与价值”是刘先生最关心的问题。他倡导，“往自己的传统之内去觅取资源，加以现代的解释，以面对现代性之挑战，而寄望于未来”<sup>⑤</sup>。因此，反思中西历史、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

<sup>①</sup>傅伟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诠释》，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

<sup>②</sup>张灏：《世纪末的危机意识》，《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第55期。

<sup>③</sup>杨春梅：《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

<sup>④</sup>牟宗三、郑家栋：《道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家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页。

<sup>⑤</sup>刘述先、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家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通过“文化中国”的理念，现代新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强调了文化在新世纪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着重考究文化的精神资源与现代化。在杜先生看来，现代化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不能被理解为单线的进程。我们应当正确把握传统和现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全球化和地域化之间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sup>①</sup>而不能现代化去否认传统。在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杜先生一方面希望儒家文化能秉承“沟通理性”的原则，做到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不偏不倚，<sup>②</sup>另一方面也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由此可见，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抱有充分的肯定，同进倡导民族文化外扩式发展。

随着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的互动交流，三个学派逐渐在某些观点上达成了一致，甚至有些学者立场发生了转变，如徘徊于保守和激进之间的余英时和后期的李泽厚。从个别具体的文化与普遍抽象的文化相区别出发，余先生指出，文化和现代化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现实生活不是与中国文化相脱离的，它是中国文化的具体化。<sup>③</sup>而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sup>④</sup>。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上，余先生批判了那种用“西方文化”打倒“中国传统”，或主张用“中国传统”打倒“西方文化”的观点，而主张中西两种文化的互动。在此基础上，余先生乐观地指出，中国的价值系统是不会因现代化而瓦解的。

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和“西体中用”论而被归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的李泽厚在90年代发生了思想转变，其逻辑思路由文化激进主义转向了新文化保守主义。与林毓生的“创造性的转换”不同，李先生提出了“转化性的创造”的理路，这是“因为‘创造性的转换’是以一个即定的模式为转换对象的，也就是说以西方的模式为转换对象的”<sup>⑤</sup>。在“转化性的创造”的基础上，中国应建立以儒为主，儒道互补文化体系，以群体价值本位的乌托邦解决现代人个体意识膨胀引起的精神冲突。<sup>⑥</sup>

在20世纪后半期再次崛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以维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为己任，反思和吸纳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更加客观地审视儒家传统的优劣。如以“本体诠释学”著称的成中英先生也认为，文化存在着整体性、共生性和互动性。因此新儒家文化应做到兼并包容，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自我转化，从而在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中发挥创造力和协同力。可见，在当代新儒家看来，现代化和儒家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

#### 四、三大学派的发展特征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史，文化现代化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在不同的文化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相异的特征。从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话语转换”。而这一现象展现了近十年来中国文化研究进程的特质。

从三大学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由三足鼎立、互相争鸣逐渐演化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如在马克思主义学派阵营里，学者们对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张岱年先生曾在论述中国传统

<sup>①</sup>杜维明：《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在纪念联合早报创刊75周年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上的发言。

<sup>②</sup>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词》，《读书》1995年第10期。

<sup>③</sup>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第11期。

<sup>④</sup>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sup>⑤</sup>李泽厚：《谈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和艺术》，《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sup>⑥</sup>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时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虽然极为明显，但传统文化也有不少积极、健康的思想，如民本思想、革新思想等。而马克思主义者方克立先生则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分别发表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卓有见解的学术论文。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真正地本着批判继承、转化创新的理念，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不仅在文化观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而且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结合。从自由主义西化派新生代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超越了胡适、殷海光等的思想，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契合。在文化保守主义内部，海外学者傅伟勋提出了“批判地继承、创造地发展”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的文化态度的延伸；新儒家学派也改变其过去的态度，主张区分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过程中吸取其积极意义上的方法，把对话看作是“儒家在现代世界逐渐壮大深入的一个重要起点”。此外，在维护其保守主义立场的同时，新儒家学者宣扬自由的价值，产生了“儒家自由主义”这一居中思想。

从分歧的着眼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在超越西化、实现现代上基本达成共识，其分歧转化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等具体方略的、非根本性问题上。体用问题是“五四”运动掀起的文化论争，“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文化学者各持一端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争鸣逐渐消解，三派学者超越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文化模式，关注的焦点由“要不要现代化”转向“如何实现现代化”。学者们都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儒家文化也是构筑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资源；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糟粕，如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等的流行助长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功利主义的偏向使伦理道德产生了危机。因此，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要采取批判的眼光、审慎的态度进行筛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的互动是 20 世纪末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同时也从客观文化史发展的角度明证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路——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贯彻创新思想，借鉴和融会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学派的进步思想，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缩影。不论是传统文化不还是西方文化，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们都凝聚了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精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但只要在百花争鸣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中国文化发展将会获得新生。

#### [参考文献]

1. 谢惠媛：《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述评》，载《天府新论》2003 年第 5 期。
2. 谢惠媛、郭文亮：《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述评》，载《河北学刊》2003 年第 5 期。
3. 陈始发：《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述评》，载《理论学刊》2006 年第 2 期。